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文艺理论

王 超

乐由心生与文如其人相似,写出来的音乐不会欺骗自己也欺骗不了历史,脱离创作本质,作品不可能有灵魂

名师谈艺

创作,把心铺在纸上

陈其钢

音乐创作第一要义是什么?中国最早的音乐论著《礼记·乐记》就已经给出答案:“唯乐不可以为伪”。同是《乐记》,开篇首句便是“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简单地讲,就是“乐由心生”。作为创作者,要真实地将自己的心铺在纸上,如此才能写出“活”的音乐。

今年初春,我的合唱处女座《江城子》在国家大剧院首演。这是一首在我内心深处产生共鸣的诗词。苏轼19岁与王弗结婚,夫妻二人琴瑟调和,甘苦与共。王弗亡故十年后,他在密州梦见亡妻而写。生者与死者虽然幽明永隔,感情的纽带结而不解。

为了用音乐表达出“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的情感,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位既有中国传统戏曲功底又接受过良好西方声乐教育,同时音乐感、理解力俱佳的男演员扮演苏轼,但始终没有找到。最后我决定由女演员演唱,因为终究最重要的不是男声女声,而是揭示这首词的内涵——唯其真实,唯其强烈,才能动人心魄。这首作品无论是独唱还是合唱,难度都相当高。但通过长时间认真排练,演出效果令人振奋,我们在国内合唱技术基础上实现了一次飞跃。

音乐所以被称为人类共通的语言,同样因为它“由人心生”。一部作品要想真正走出去,必须是表现“人性”、表现“真善美”的。也许有人会问,外国观众能理解化自古典诗词的《江城子》吗?我亲身体会过苏轼词中的物,相信只要真诚地予以表述,无论哪个国家的观众都能感受得到。同样,我的作品《蝶恋花》使用不同于西方古典音乐的中国传统乐器和入声,在国外常演不衰,也因为它揭示了女性动人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历程,观众有共鸣。

乐由心生与文如其人相似,写出来的音乐不会欺骗自己也欺骗不了历史。明明在应付差事、对付行活或者出风头、赶潮流、炫耀技巧,却冠以漂亮的说辞,如此脱离创作本质,作品不可能有灵魂,最终是短命的。去年10月,我取消了新作品《如戏人生》的首演。因为经过排练,没有达到我的预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最大原因是我太超越,音乐之外的因素带来压力,创作成为包袱,作曲也就不再纯粹了。我的一些作品时隔二三十年还有蓬勃的生命迹象,另一些作品首演不久就萎靡下去。这与写作时的心态有很大关系。作品久演不衰的外部原因必定是契合时代,内部原因则是我写每一个音符时都投入全部心血,创作背后有强烈的心灵和情感经历,那种状态让我产生了“弃一切美学牢笼而不顾”的力量。记得在刚结束《五行》写作时,由于整整4个月精力高度集中且始终独处,我连续几天话都不会说。

严肃音乐创作如此,通俗音乐、电影配乐也是这样。我为电影《金陵十三钗》写音乐时,从创作伊始到调整配器关系和音乐分寸,再具体到用不用弱音器,演奏员什么时候吸气、什么时候屏住呼吸等等,可以说细抠到每一个环节。普通听众虽然不了解音乐如何构成,但能直接感受到结果。可能不到两分钟,但我是把整个心放进去,音乐感染力就不同。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还有一层含义就是音乐创作要体现个性即哲学家所说的“本质自我”,同时,这种个性离不开“群体”观照。法国哲学家萨特认为,自我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且永远也不会完成,直至死亡。我认为“自我”只有在群体中才有意义,每个人的个性、每一首作品的自我,都是在社会影响之下逐渐形成,并永远与群体互相对照、影响和变化。就像我们的语言,如果没有你、没有你们,怎么会有我的语言个性呢?

要成为真正的音乐家、艺术家,除了做到“乐由心生”,还需要勇气和视野。如果没有勇气冲破环境和时尚的阻力,再有才能也难有成就。这一点,艺术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从事艺术创作的人,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路,这条路没有捷径,只能自己踩出来。

视野则代表一个人的格局。当代社会信息交流高度发达,当代中国更是处于伟大变革转型期,视野尤为重要。视野是超越专业领域、特定历史风潮和国界的,是对精神世界的好奇、关注、认知和接纳,是对死亡和生命意义等终极课题的不断思考和探索,是打破社会和人群既有成见的气魄。拓宽视野,需要跨出自己的具体专业,学习一些哲学,需要跨出自己所处的时间段和小环境,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看问题;同时视野向内,关注“人”本身。孔子、老子被全世界尊为人类文明之宝,因为他们贡献了关于“人”的哲思。缺乏这种视野,创作出来的音乐就很可能只是空洞之味,难以跨文化进行沟通的,乃至短命的。

艺术创作是在搭建人类理想的精神世界,也是在创建自己的精神空间,需要一系列作品来丰富和完成。它需要极大的心力、体力和毅力,以及不断丰富、不断更新的思考,并且持续一生——累得很,但幸福感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愿年轻艺术家创造出既诞生于这个时代又超越时空,在表现自我的同时传递人类共同思想情感的真诚之作。(本报记者王佳可采访整理)

陈其钢,1951年出生于上海,旅法作曲家,青年时期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1984年赴法国深造。1998年出任贝桑松国际作曲大赛评委会主席,2005年获得法国音乐版权组织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交响乐大奖”。曾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并创作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2013年法国政府向陈其钢颁发“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代表作品:管弦乐《五行》《蝶恋花》,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合唱《江城子》,电影音乐《归来》等。

文艺评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下,如何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文艺作品?如何推进新时代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创新?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和著述,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文艺思想紧紧围绕人民中心,从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要求创作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全面阐述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宗旨论、创作论和批评论。

人民中心与文艺宗旨论

文艺理论的基础问题包括“何谓文艺、文艺何为”。中国古代有“诗言志”“诗缘情”“文以载道”“文以气为主”“文贵载心”“文之为德”等诸种表述形态。在西方,柏拉图认为文艺是对理式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他对“灵感说”的解释是“神灵附体”和“迷狂”。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文艺是摹仿。中国古代文艺观也好,西方古代灵感论、摹仿论也好,都是各自时代文明土壤的产物,也有一致之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有一个重要维度,即从社会关系角度认知文艺。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谓人民的文艺,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他继而分析道:“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文艺属于人民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根本宗旨的体现。例如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意识到大城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较多,认为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就要要求高尔基到工人、农民及部队中去接触新生活、发展新文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服务的对象进行全面分析后指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工作者必须同人民群众、工农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大创新。一脉相承的是,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江泽民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习近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人民中心论的社会主义文艺本质观,他认为:“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并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展开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尤其是“热爱”一词,将两者整合成一种深层贯穿的意义圆融体:“热爱人

相比于历史上种种文艺本质观,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有一个重要维度,即从社会关系角度认知文艺。习近平文艺思想认为,我们的文艺只有紧紧围绕人民,彰显中国精神,才不会失魂、失语、失声,才能有血有肉、风骨凛然、气韵生动、鼓舞人心。只有在人民之中创新,在中国精神之上发展,才能有效构建中国话语、凝聚中国力量

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所以习近平同志不赞同“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而是对柳青为写《创业史》在人民群众中蹲点14年的创作实践大加赞赏,这根本上是源于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人民生活与文艺创作论

文艺属于人民,创作就应坚持立场,创造出人民满意的文艺作品。

从创作来源上讲,习近平同志认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文艺作品从生活中取材,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文艺中的具体体现,文艺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这也是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列宁从认识论角度分析:“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和基本的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中更加直接地断定:“美是生活。”在习近平同志看来:“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指的生活是广大人民的生活:“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而且,文艺不仅仅是人民生活的再现,还要提升为一种精神力量,对时代作出思想引领,这是对“实践—理论—实践”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创造性转化。文艺创作决不是闭门造车,冥思苦想得来的,作家应当“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思着人民的忧思”,心中有人民,笔下才有文章。

从创作过程上讲,习近平同志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例如有的千篇一律、抄袭模仿,有的胡编乱造、哗众取宠等,追名逐利,没有“走心”。用眼球效应取代人民认可,用经济效益取代社会效益,这些都是缺乏创新能力和精品意识的具体表现。那么文艺应当如何创

新?习近平同志认为:“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创新并非“无知人胆大”,而是“艺高人胆大”。这里的“艺”,在习近平同志看来,并非只是形式之艺,而且还是一种实践之艺,一种对人民生活的体悟之艺:“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文艺创新的过程,实则对人民生活的思想升华和艺术表现过程。例如《诗经》《红楼梦》《阿Q正传》等,这些经典都能让人触摸到作者对人民生活的真实关切,带着这种关切深入现实、深入人民、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处处都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人民需要与文艺批评论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的标准、立场、方法是什么?

文艺批评并不只是读后感或心得体会,在习近平同志看来:“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对文艺创作而言,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文艺批评来看,也鼓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社会主义文艺的宗旨是为人民,这就意味着文艺批评应当恪守“人民中心”这个基本属性。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那么,什么是人民需要的文艺作品?他认为:“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因此,人民需要、人民喜爱,这就是文艺批评的重要标准,文艺批评就应当根据这个标准来激浊扬清、“剥烂苹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阐述文艺批评的“人民标准”:“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邓小平同志也持同样观点:“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根本标准,在

文化交流要增强主体意识

郑荣健

气海观澜

走出去不是终点,走出去而产生有效影响进而让外国朋友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才是目标

提到文化交流,不由想起两年前一个话题性事件。流行歌手尚雯婕与一位非遗传承人共同演绎一段《要荆州》,以自己创作的法语歌曲为主体,加入渔鼓道情说唱。歌唱家李谷一直言将非遗和外文结合,会失去传统文化韵味,尚雯婕认为,面对国外观众时,这种“组合”会达到更好的效果。二人交流在网络上引发大量“弹幕评论”,也由此折射出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话题: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不是一个新话题。从戏曲出海开始就有大量探讨和实践。上世纪20年代,京剧大师梅兰芳赴美巡演,为了让外国朋友看懂听懂,在节目选择、删改、翻译、包装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最后选定《贵妃醉酒》《天女散花》等剧目。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戏曲出国交流,也多选用《三岔口》《大闹天宫》《挑滑车》等偏“动作类”剧目。这样的剧目容易跨越语言障碍,有效扩大传播影响。不过,熟悉中国戏曲的观众并不满足,因为它们离全面展示博大精深中国戏曲艺术相差甚远。与此同时,外国人也产生了不少误解,以为中国

戏曲表演就是哑剧、民间舞蹈和歌曲,以致出现这样一幕:在1956年华沙举办的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会上,《猎虎记》获哑剧一等奖,《水漫金山》获民间舞蹈一等奖,《玉堂春》获民间歌曲一等奖。令人啼笑皆非的同时,也引发人们思考。

文化交流是有阶段性的,在交往不充分、融合不全面的初始阶段,找到交流双方契合点,顺着契合点逐渐深入拓展是必由

之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过去的思维应该有所调整。这个调整不是刻意彰显“我”而忽视“他”,而是以一种更加平等包容的姿态重新认识我们的文明形态、梳理我们的文化血脉,更好地做到既薪火相传、代代守护,又能够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走出去不是终点,走出去而产生有效影响进而让外国朋友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才是目标。中国五千年文明,丰



漫画

徐鹏飞

富的文化遗存中无论是书法、美术还是音乐、舞蹈、戏曲等,都自成体系、特色鲜明,文化交流之所以必要,恰恰就在于人类文明的这种多样性。

值得欣喜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关注和纠正。比如有人提出“戏曲”不应该翻译为China Opera,而应该直接翻译为Xiqu。从学术角度讲,Opera所表达的内涵基于西方偏情节架构的戏剧形态,不能代表包括程式、声腔及众多剧种在内的中国戏曲;从文化角度讲,Xiqu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确立自身方位、传递中国审美语汇的信息。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有效的传承和保护,让中国文化不至于在迎合他人的“无知”中肢解和曲解本来内涵。

在这个充满生机的时代,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中国正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中国智慧。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如何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显得尤其重要。那些最富含中国信息、打着深刻民族烙印的民族文化瑰宝,应更多以原汁原味的形态走出去,相应地,我们需要做更多细腻有效、服务周到的阐释普及工作。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信,也有这样的责任自觉,以更具主体意识地表达自我、沟通世界。